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立场及其文学批评策略

曾 翔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 四川 德阳 618000)

摘 要: 阶级和性别不仅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立场,也展示了女性受压迫的两种模式,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分割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突破过去所有类型女性主义的地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将阶级作为核心观念,并结合诸多观念和理论,诸如心理分析、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公共领域理论、文化生产观念等,发展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批评策略。

关键词: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阶级;性别;公共领域;文化生产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11)02-0144-06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以男女二元对立作为基本立足点,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压迫,倡导个体性,甚至如激进女性主义倡导同性恋,显得单一而缺少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出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关注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因素,关注因经济基础不同而带来的女性社会阶级地位的差异。然而,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因素,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女性个体差异带来的性别差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应运而生。目前国内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还非常少,将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结合的就更少了。本文的目的在于阐释其含义并梳理其发展,同时探讨其文学批评的理论立场,以期推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含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常常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不同于二者的另一个分支。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早出现在1969年,起源于对女性流产权力的争取,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1973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将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分析与性经验意识结合起来。1975年,在荷兰建立了“女性主义社会主义论坛”(Feminist Socialism Platform),将左翼激进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同年,国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会议在俄亥俄州安提俄克大学召开,来自高加索的女同性恋者激情陈辞:“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同性恋与异性恋者,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坚信发展一种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综合性理论与实践的时代到来了,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社会主义需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需要社会主义。”^[1] 1970年代中期,最早也最成功的女性主义自由联盟在芝加哥成立,致力于为性别和社会阶级体制而奋斗。从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再是单纯的女性运动,而更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并且是“与人们生活的物质历史条件相关的,而这些条件是由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界定的”^[2]。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无关系。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一致的,都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女性受压迫的境况,寻求最终解放女性的途径。但二者也有不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 收稿日期:2010-07-27

作者简介:曾翔(1974-),女,四川眉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

以经济基础不同所造成的阶级压迫作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认为只要消除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消除了阶级压迫,女性受压迫的状况自然也就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更关心公共领域的工厂劳动,关心薪酬劳动,关心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而不关心家务劳动、爱、性暴力以及女性缺少政治权利的问题。与之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思维的同时,认为当今女性的社会地位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果,也是父权制性别体制的直接后果,社会与心理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因素。在关注的焦点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仅关心女性生活的公共领域,还关心女性生活的私人空间,尤其是关心母亲式的无偿劳动,关心女性的家务劳动,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心的核心主要是作为人的女性。

对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这一名称,有人并不满意。正如芭芭拉·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说:“一方面,这个术语太长了;一方面,对于那些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反种族歧视、反同性恋的女性主义者来说,又太短了。”^[3]然而,这是目前能够与其他女性主义相区别的最好名称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早期纲领性文章是芭芭拉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但该文在论述中又不时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两个术语混用。1978年,齐拉·爱森斯坦(Zillah R. Eisenstein)主编了《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事件》一书,“把资本主义父权制界定为对资本主义阶级构成与性别结构之间所存在着强有力辩证关系的描述”^[4]。该书被誉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精湛讨论”^[5],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综合运用,“旨在理解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与社会中性别等级关系的动态发展”^[6]。2003年,南茜·赫姆斯特姆(Nancy Holmstrom)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课题》(The Socialist Feminist Project)一文,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其他女性主义区分开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1970年代以来,许多女性不满当时流行的对女性压迫的分析,认为自由女性主义强调个体性而不够激进,激进女性主义又过于强调父权制而忽略了经济现实,于是,当性别成为一种政治策略之时,担心阶级意识会再一次抹杀性别问题。为了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就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了。“由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知道怎样把各种形式的压迫统一整合起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只得将自己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而不必相互贬低,这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却没有其他多元体系可以替代它了。”^[7]⁴⁴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具有交叉性,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阶级、种族以及性别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多元化、全球性的理论。南茜说:“那种多元化、全球化的女性主义可能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7]⁴³其实,早在1980年代,艾丽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就说过,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可能是一种更和谐完美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其目的是彰显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特点。罗斯玛丽·通(Rosemarie Tong)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把女性主义分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因为尽管有可能对二者进行区分,但那是相当困难的。”^[8]她又说:这个术语“显示了两个倾向,一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倾向,一是对源于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性别忽视的不满”^[9]。

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立场:阶级与性别

自由女性主义为了凸显女性地位,强调男女平等,认为父权制是造成女性压迫的罪魁祸首。激进女性主义一味抬高女性,贬低男性,形成了一场本质主义意识形态的再造运动。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眼里,所有性别都是阶级的性别,她们把性别放到阶级的视野中来审视,打破了单一的男/女二元对立模式,把女性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紧紧抓住女性主体性与阶级身份之间的关系”^[10]¹⁵²。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理论和压迫理论是失败的,因为忽略了男权统治的根源、结构及动因,也就忽略了性别压迫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作为激进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一样,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清楚地指出性别压迫的根源和结构。不同于激进女性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以及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维度,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动机就是竭尽所能去揭露父权制压迫下的阶级和种族差异,以及这些因素与利益机制之间的潜在冲突。将激进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最佳结合的是琳达·菲尔普斯(Linda Phelps)所创立的“父权制资本主义”(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这样一个“二元论体系”(dual theory system),她认为,女性所承受的是双重压迫体系:父权和资本(即经济)。父权代表的是性别的压迫,经济代表的是阶级的压迫,父权制模式为我们提供的是女性受压迫的形式,而资本主义则为我们提供的是女性受压迫的具体内容以及变革的动力。

阶级和性别作为女性受压迫的两种模式,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互相分割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突破过去所有类型女性主义的地方。性别和种族不仅仅是身份,而且是与阶级一样“嵌入”政治的话语,彼此不能分割,要讨论的就是阶级、性别种族与性征之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由于二元论体系的出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总是在阶级与性别关系上纠缠不清,究竟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相互独立的还是彼此关联的?如果我们拒绝社会主义的“阶级唯一”的方法,或“阶级优先”的原则,集中探讨阶级和性别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割裂地去分析资本主义与父权制,而是历史地分析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如果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性别特征和性别的阶级属性,越过种种界限去深入讨论二元论体系;那么,我们将无情地批判那种将阶级和性别分割开来的做法,正如 Harris 所说,阶级优先的方法过于强调阶级利益,从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阶级中具体的性别属性和种族经验。^[11]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阶级总是处于优先地位。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阶级和性别是无法割裂的两个维度,既要分析阶级的性别属性,也要分析性别的阶级属性。父权制资本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菲尔普斯也说:

如果性别歧视展示了男人统治女人这样的社会关系,那么父权制就描述了源于男女这种最基本的关系体系中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就像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家和工人关系基础上的一样,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交织而形成的两种迥异又彼此联系的关系体系。^[12]

在她看来,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以及女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就像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因为父权制产生具体的女性压迫,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和阶级关系则产生阶级压迫,同时将女性排除在生产之外。相较于菲尔普斯,爱森斯坦的论述更直接地显示了二者的不可分离性和相互依赖性,她认为二者是一个整体的进程,彼此需要: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相互依赖的观念不仅显示了父权制对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显示了资本主义对父权制的需要。当我们说为了进行有效的操纵,资本主义需要父权制时,那就意味着作为一种性别霸权体系,男权优势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秩序和控制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对利益的关注与对社会操控的关注就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起来(但是不能相互贬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整体的进程,每一个系统的具体元素都被对方所需求。^[13]

可以说,正是女性的生理性质注定了女性是生育后代的“工具”,也就成了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这种劳动力再生产中,女性无法工作,失去经济来源,这就构成了女性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基础,因为“女性在生育期间男性为其提供生活资料,而不是性别分工本身构成了阶级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的物质基础”^[14]。

还有许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对此进行过讨论,比如米歇尔·巴勒特(Michele Barrett)的《当今的女性压迫》(Women's Oppression Today, 1980),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小组的《妇女问题》(Women Take Issue, 1978),特别是有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传统的《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都曾集中讨论过这一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于缺少系统的主体性理论,而拉康心理学和罗兰·巴特符号学的引入则可以填补这一缺失,因而主张用心理学和符号学的方法,从阶级、种族的视角去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策略

随着社会理论的多元化,除了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之外,女性主义吸收了弗洛伊德和

拉康心理分析的方法,以解构现存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关系。虽然女性主义已经有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自治性分析,但是在社会等级制度、女性主体性分析、心理分析、语言分析等方面还不够完善,特别是自由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强调统一的女性主体,忽视阶级和种族,使得“其他的社会结构关系都在隐退和消失,给我们留下的唯一重要的戏剧脚本则是赤裸裸的性差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推崇性别,将其与其他的社会决定形式分隔开来,就性差异在话语中起到的作用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同样片面的解读,成为抽掉了最棘手、最具意义的内容的一种解读”^{[10]148}。这是大多数女性主义批评所存在的问题。与之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显示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她们不仅仅局限于性别视角,也不局限于文本分析,从性别、阶级和种族立场出发分析文学文本以及生产条件,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性差异及其隐含的社会和心理意义,突出女性叙事和女性主人公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并尽量将其心理部分社会化,还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异质性语言视野下女主人公是如何被语言所建构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焦点应放在文学内部的异质性上,放在产生社会和心理意义的所有范畴之间明显的紧密关系上,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关注内容,而且也要考虑文本建构主体性并为其设定位置的语言过程。”^{[10]150}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并没有得到普遍运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也不多,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者是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珍妮·巴切内(Jennie Batchelor)等。前者在对女性主体性的论述中充分运用了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方法,对女主人公进行阶级和性别的分析,认为阶级是性别的阶级,性别是阶级的性别。后者作为18世纪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研究18世纪女性写作中的帝国意识,特别是简·奥斯丁作品中帝国意识的呈现。在两人合编的《英国18世纪的女性写作》中,还突出了18世纪文学文本的生产问题,认为18世纪的女性“不仅是小说作家,还广泛进入剧本创作、诗歌、翻译、儿童书籍、回忆录、旅游书、政治类作品,不仅是作家,还是印刷出版者”^{[15]7}。应该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阶级分析法。

性别与阶级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但这同样可以作为文本分析的策略,文学文本成为生产阶级意义的重要场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经济和政治的决定因素考虑到性别差异中。正如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意识形态,但审美意识形态同样可以作为一种文本分析方法^[16]。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批评常常强调男/女二元对立,忽视因阶级区分而带来的社会差异,在19世纪的小说文本中,性差异和社会差异的双重刻写是最常见的典型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妇女之间的差异与性别之间的差异同样重要,都是用来再现阶级和性别的手段。从《曼菲斯尔德庄园》到《苔丝》等一系列作品都有一个常见的主题,那就是阶级是性别身份的一个重要来源,性别身份成为阶级的一个象征。

从1890年代启蒙时期最流行的安·拉德克利夫的哥特式小说《尤多尔佛的秘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主题。来自意大利的女主人公艾米丽,为了逃脱主人的胡搅蛮缠,离开了上流社会,可是在仓促中忘记了戴帽子。在那个上流社会中,帽子是女性纯洁的象征,不戴帽子就意味着淫荡,必将遭受歧视。当艾米丽在一个农家女的手里买到一顶小草帽时,她又恢复了女性纯洁与高贵的身份。科拉·卡普兰在《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一文中说:“妇女的阶级主体性及其性别身份就这样在19世纪的话语中结合在一起,呈现了新的和具有欺骗性的意义维度。统治阶级传统上把妇女的性和持家美德作为衡量其道德权威的手段。通过聚焦于女性性行为的表现和形象,可以置换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17]95}

第二是精神分析法。

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对歇斯底里的精神病人进行分析的理论结晶,大多数女性主义批评者因此并不愿意使用心理分析法,她们认为这是对女性的贬低,直到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之后,女性主义特别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才开始广泛将心理分析法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尤其是拉康的女弟子西苏、克里斯蒂娃等。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拉康成功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之间联系的大门。兼有心理分析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身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的《心理分析与女

性主义：弗洛伊德，帝国，莱恩与女性》(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Freud, Reich, Laing and Women, 1974年初版；2000年再版时更名为《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激进再评价》，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A Radical Reassessment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将一般认为不可调和的心理分析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可能为无父权结构下对孩子的教育提供了一种有效模式，如果家庭缺乏浪漫主义，那么孩子在成长中就可能会缺少俄狄浦斯情结。米歇尔坚持认为要把女性从根深蒂固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减少她们的阴茎嫉妒和被阉割的感觉，只有这样女性才能真正解放。“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内部，一场关于精神分析理论范式应用价值的激烈而未见分晓的争论在继续着，争论的焦点是精神分析理论范式的非历史性。在那些对精神分析学抱有敌意的人看来，精神生活的意义、幻想和欲望——前两个世纪的小说和诗歌所执迷的主题——似乎特别难以阐释。”^{[10]152}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小城》(Vellitte)也是一个典型的描写女主人公心理的小说，玛丽·雅克布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对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主体性分裂进行了再现，并将这种心理分析与社会意义分析结合起来进行诠释，把女性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张力联系起来，将文本中的断裂解读成一种心理叙事，将其历史地置于19世纪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文化中。科拉·卡普兰指出：“《小城》的社会意义在‘强有力的幻想面前’隐退并最终消失了，这种幻想‘赋予《小城》以活力，使一部分读者得到满足，这些读者也常常渴望为一个顺从的、可控制的、自恋式愉悦的自我形象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而摒弃现实’。按照雅克布的阐释，心理、欲望和幻想代表被压抑的、一种已经被忘记的女性主义的肯定因素，而社会则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规范的白日世界。”^{[17]84}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的过程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下，心理分析为女性提供了社会变革模式？心理分析是否暗示了女性不可避免的宿命？为了更清晰地掌握女性是如何形成女性主体身份的，心理分析是否必须进行理性分析？心理分析是否真正让我们对性和性属进行了有效区分？“必须改变那种家庭内外的工作环境，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口袋’(经济)，才不至于因为是女性而受到无尽的轻蔑。”^[18]这就不仅消解了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常见的男女二元对立分析模式，也同时消除了那种理性与激情的二元划分。

第三是语言符号学方法。

文学创作显然不只是一种文学生产，更是对世界的阐释，是创作主体用语言表达特殊意识形态的方式，因为文学是社会各部门与文化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表达，是人类经验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是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总和，而文学的所有这些都是靠语言符号来表达的。

符号学介入女性主义的可能性，在语言学家和心理分析学者朱丽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叙述中最为明确，她认为符号与弗洛伊德作品中所说的婴儿的前俄狄浦斯情结密切相关，英国对象关系学派的精神分析和拉康的前镜像阶段都是感情的领域，都与直觉紧密相关，存在于语言的断裂与罅隙之间，而不在于语词的所指意义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符号象征与严格意义上的数学意义是相关的。她举例说，作品中的“落魄、屈辱”就是这样的概念，涉及到排斥的心理力量，直接指向母亲形象。她甚至说：“对母亲强烈的依赖转化成了符号之间的关系，他者的法则总是在交流语境中产生的，进入符号系统就意味着进入了社会第一审查体系，正如主体以想象进入外部世界一样，主体在符号意义中开始遭遇阉割。”^[19]

精神分析法与符号学在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中的运用极为普遍，如果说一般的精神分析法主要关注无意识、性属、性征以及欲望、同性恋、异性恋等，关注女性特质，关注恋父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那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精神分析法的运用就侧重于打破心理分析的封闭模式，将心理分析与社会机制和阶级属性结合起来，展示不同阶级、种族的女性不同的心理文化，并最终关注女性的经济状态，为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而努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符号学的引入，不仅关注文本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注符号的审美意义，关注符号所阐释的社会关系，还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探讨符号所展示的女性心理意义与女性的阶级属性等。

第四是文化生产、公共领域概念的引入。

自从1962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问世之后,对女性写作的公共/私人领域的讨论开始升温。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女性家务劳动的关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外,认为女性仅仅处在家务劳动领域,否认了女性在公共观念形成中的作用,这成为近年来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竭力反驳的观念,在《英国18世纪的女性写作》中,大多数研究者认为18世纪女性处于当时文化生产的中心,在当时就参与到各式各样的公共活动中。克拉克(Clarke)认为18世纪女性写作有一个重大转变,从女性以边缘身份挑战文学文化霸权到女性实质性地进入文化中心进行生产,最后结论是“公共领域并不永远是男性或者资本主义的”^[15]。

在巴切内与卡普兰合编的《女性与物质文化:1660—1830》中,巴切内在《还原“流行帕梅拉”》(Reinstate the ‘Pamela Vogue’)一文中,认为“流行帕梅拉”体现了“18世纪文学、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令人瞩目的持久的唯物性,显示了帕梅拉所产生的争议及其实质是内在的,与当代的论题紧密相关,如物质与道德、女性主体与客体世界等。”^[20]研究文学中的女性购物,其实是把性别身份与阶级地位结合起来,不仅如此,女性的购物其实是极具生产意义的,即使这些消费者并不完全明了这些意义。

以上四种方法,显然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策略的视野,对其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Gloria Martin. *Socialist Feminism, the First Decade, 1966—76*[M]. London: Freedom Socialist Publication Press,1986:88.
- [2] Anja Meulenbelt. *A Creative Tension: Key Issues of Socialist-feminism*[M]. Boston: Southend Press,1984:7.
- [3] Barbara Ehrenreich. *What is Socialist Feminism?* [J]. *Win*,1976(June 3).
- [4] Madsen, Deborah L. *Feminist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M]. London:Pluto Press, 2000:193.
- [5] Levine, Rhonda F. *Legacies of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 in Enriching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ow Radical Sociology Changed the Discipline*[M]. Brill Press, 2004: 8.
- [6] Zillah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1.
- [7] Nancy Holmstrom. *The Socialist Feminism Project: A Contemporary Reader in Theory and Politic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2.
- [8] Rosemarie Tong. *Feminist Thought: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2008:12.
- [9] Imelda Whelehan. *Modern Feminist Thought: from the Second Wave to ‘Post-feminism’*[M]. Scotland: El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5:44.
- [10] Cora Kaplan. *Sea Change: Culture and Feminism* [M]. London: Verso Press, 1986:152.
- [11] The Feminist Review Collective. *Feminist Review issue 35 Journal Series*[J]. London: Routledge,1990:86.
- [12] Linda Phelps,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J]. *Quest*, VOL.2 NO. 2(Fall)1975:39.
- [13] Zillah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27.
- [14]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Toward a Unitary theory*[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147.
- [15] Jennie Batchelor, Cora Kaplan. *British Women’s Writing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M].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5.
- [16] 童庆炳. 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批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54-159.
- [17]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G]. 刘象愚,陈永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8] Elizabeth Wilson. *Psychoanalysis: Psychic Law and Order*[J]. *Feminist Review*, 1981(8):76.
- [19]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48.
- [20] Jennie Batchelor, Cora Kaplan. *Women and Material Culture,1660—1830*[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7:173.

责任编辑 韩云波